

家庭背景影响了人们教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获得

张翼

【提要】通过对2008年全国性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后发现：以父母亲为表征的家庭背景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获得，而且还影响了人们初次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和现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这预示着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高；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越低，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低。由此可见，1999年之后高等教育的扩招，给社会上层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社会下层的收益，使中国社会增加了封闭性特征而非开放性特征。这会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公平性，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强烈关注。

【关键词】家庭背景 教育差异 社会经济地位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 (2010) 04—0082—11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伴随这一转变的发生与继续深化，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也得以重新型塑。在市场机制日益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某些新产生的阶层，不仅在市场化过程中取得了其应有的经济地位，而且也日渐固化了其在社会等级中的序列。虽然市场化、快速城市化与工业化或后工业化过程，曾经一度为全社会——亦即为各个社会阶层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机遇，但中国社会的阶层再生产模式，却通过人力资本或教育资本的传承竞争，增加了阶层封闭性特征，并在“初职”就业地位获得和“现职”地位获得中强化了家庭背景的影响。这既与现代化社会所要求的以“后致性因素”为主获得职业地位的要求相背离，而且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本文拟通过阶层出身，以及这种出身对教育资本的影响，进而分析人们的职业阶层地位获得——即从“初职”社会地位到“现职”（终职）职业阶层地位的获得上，揭示阶层继承的连带影响，并针对分析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可能的政策性建议。

一、研究假设、变量与数据介绍

（一）研究假设

众所周知，传统农业社会的封闭性特点，既束缚了人口的迁徙与流动，也固化了家庭代际之间的职业或阶层继承。如果不是兵役劳役抑或灾荒，农民的子女必然要继续做农民。农民的职业技能，只需家庭内部的传承而不需其他专门培训即可胜任。但工业社会打破了家庭为单元的生产和再生产模式，分化了社会的职业结构，在国家 and 家庭之间组建了企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社会分化的细密化也带来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人们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就必须接受除家庭之外的专门教育与培训。因此，人们的劳动技能和生存方式等教育资本，才日渐彰显其重要性。一个劳动岗位所需要的劳动程度越复杂，胜任该岗位的劳动者所需的教育资本就越高，其需要接受的教育时间就越长，支付的教育和培训费用就越高。^①

① 张翼：《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与代内流动》，《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

因此，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人们要想取得较高的收入、获致较高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通过教育体系积累自己的教育资本。而教育体系，也适应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特点，合法地建构了初级、中级和高等教育等级，以供不同年龄和不同经济能力的家庭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自己要提高自己的阶层地位，或者要想使自己的子女提高其阶层地位，就必须参与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因此，稀有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具象地表现为各个阶层在代际之间维持或晋升社会地位、巩固或增强权力资源、表现或展示社会声望的重要手段。尤其当文凭成为就业场所的主要人力资源表征时，是否能够获得更高一级的教育机会，就成为一个人能否就业、在何种场所或单位就业、或者获得工资回报的机遇性评估尺度——这个尺度，还是由政府所赋予和保护的合法性、合理性尺度。时下的中国，不管是在公务员的招考，还是企事业单位的招聘，都明确写出了需求人员的文凭标准。正因为如此，哪些阶层能够为自己、或者为其子女较多竞争到较高级的受教育机会，或者拿出较多的经济支持帮助自己或子女在这些竞争性考试中居于优势地位，就成为家庭经济支出决策的重要内容。

也因此，家长的阶层地位、社会网络和货币支付能力，一方面通过经济支持，为自己的子女购买或争取教育机会，使子女获得合法合理的入学竞争能力——比如参加各种名目的考试、聘请有经验的老师课外辅导、缴纳高昂的赞助将子女转到重点学校等——这被形象地总结为“掏票子”；^①另外一方面，也通过家长的阶层地位和阶层关系网络，为子女创设有利于其发展的社会资源，使子女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教育收益——这被形象地总结为“批条子”、“找路子”。当然，优势的阶层地位，在更惯常的情况下，还表现为文化的代际传导——毕竟，接受过较多教育的家长，能够以自己之所学，或者直接辅导子女的功课、或者间接启发子女的学业、或者激励子女的志向，使子女之所学直接指向于未来的就业目标。所以，家庭的阶层背景，亦即家庭的阶层出身，尤其是父亲或者母亲的阶层地位，对子女的教育获得，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貌似开放的机遇，实则为很多经济的和政治的门槛所隔阻，故在个人通往未来的道路上，除自身能力、天赋、运气、努力等因素的影响外，家庭的阶层出身，是一个切不可被忽视的变量。有研究表明，即使是在“文革”后期——1972年至1976年，70%通过推荐入学的大学生是高干子弟，或是那些有政治关系的家庭的孩子。^②由此可以得到：

假设1：人们的家庭阶层出身，显著地影响了其教育获得。家庭出身越优越，其获得较高教育资本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外，教育资源不仅是稀缺的，而且在区域分布上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区域分布的差异表现在城乡区分上，是城市的教育资源优于农村；表现在地区区分上，是沿海及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优于中西部地区。即使在同一区域内部，即在城市行政区划内部，抑或是在农村行政区划内部，也表现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差异。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尤其是师资资源，远远优于普通学校的师资资源。重点学校的教育财政投入与设备配备，抑或接受的社会捐赠，也优于普通学校。这种差异所造成的格局，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和高中，甚至于在大专院校和高等院校，都普遍存在。^③但要具体区别哪些人进入了重点学校，哪些人进入了非重点学校，的确需要特殊的资料收集渠道。而且问卷调查所需要的抽样设计，也应该根据研究设计而分配样本。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拟以户口这个被先天赋予的变量来区别被访者的城乡所属——尤其是以一个人14岁时母亲的户口来区别人们的城乡户口特征，并以此检视“地区”这个变量给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到：

假设2：人们所在的地区与户籍属性，由于与该地区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密切相关，故由此也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获得。

另外，1999年以来的高等教育扩招，是中国社会的大事，被誉为教育之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事实上，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推行，高等教育的扩招，也为适龄受教育者提供了高中阶段受教育机会。在高中适龄人口缩减的同时，大学生的升学率有了本质性的提高。因此，教育的扩张，迅速提高了新生中国社会劳动力的平均教育资本。但这种提高所造成的连带影响，就是增加了社会就业压力，尤其是增加了非体力劳动者的就业压力。

这就是说，与教育短缺供给的时代相比，教育文凭有可能贬值——即与入学之预期相比，毕业时获得的初职社会地位有可能降低。为免遭贬值之影响，家长必须动用一切社会资源去帮助子女的就业，使子女的“初职”职业地位获得，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上层阶层的家庭，或者说父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能够通过自己的社会资本和关系资源，顺利化解风险的袭扰，帮助自己的子女，获得相对较高的职业阶层地位。如果在“初职”职业阶层地位获得中难以实现此一目

① 家长的这种竞争性特点，并不只表现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甚至于更早——在非义务制教育的早期，对幼儿园的选择，就充满了竞争性特点。在乡村，能否上幼儿园，在城镇和城市，能够上什么样的幼儿园，决定着子女对小学的选择。
② 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③ 陈彬莉：《教育获得之中的路径依赖》，《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4期。

标,则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现职”或“终职”职业地位获得中,则可以看到显见的家庭支持。

正因为如此,某些上层阶层成员,即使自己的子女难以在高考中获得通向上层社会的入场券——录取通知书,也会通过其他合法途径,比如非全日制教育,或者通过在职教育,轻易地拿到为人事制度或求取社会承认的文凭。不仅中国的各类学校在制造着各种各样的机会,就是西方的大学,也为中国学生广开了门路,设计出了各种省钱的机制,以满足日益扩张的富人阶层的文凭需求。所以,教育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人丰富了某一种资源,就可以通过资源交换以相对便捷地获取其他资源。因此,除全日制教育之外,非全日制教育和国外教育,也为上层阶层成员及其子女的教育获得,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机遇。^①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理由理解这一社会现象:一方面是教育文凭在贬值,另外一方面却是富人阶层想尽一切办法,在教育渠道中获取文凭。由此我们得到:

假设3:人们的阶层出身,也显著影响其初职阶层地位的获得。如果因各种社会制度配置的限制,这种影响难以在“初职”显示其重要性,也会通过继续教育的中介,在“现职”地位获得或“终职”阶层地位获得中显示出显著影响。

当然,在教育扩张为教育需求提供了必要通道后,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日渐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率先在城市降低了生育率,继之在农村大幅度降低了生育率。这直接导致了家庭子女数——或曰一对夫妇所生子女数的大幅缩减。城市户口的新婚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农村户口的新婚夫妇,也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到1980年代甚至于降低到平均只生1.5个孩子。这使改革开放之后家庭总收入提高的同时,也迅速提高了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也就是说,在家庭人口规模缩减的情况下,家长更有能力提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城市,不管是生育了男孩的家庭,还是生育了女孩的家庭,都能够集中资金投资子女的教育。这种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一个“非预期结果”,就是消除了传统社会非常显著的性别受教育差异。也就是说,在家庭子女数较多,对子女的投资会自然存在男性选择偏好。但计划生育——或者一对已婚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时,这种性别选择性偏好,就失去了存在基础——只要家长愿意投资于子女的教育,其不得不只为自己那唯一的子女而投资,而无论其性别差异。差异可能只存在于社会性别所要求的兴趣或文化性别导向,而不可能存在性别之选择。正因为如此,生育的子女数越少,家庭集中投资于子女身上的资金就越多,子女的“家庭学习条件”就越好,学校的教育资源就越优越,与父母亲

的沟通机会就越多。^②这可以导出另外一个假设——

假设4: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消解了家庭投资中的性别差异,由此也使女性获得了较多的教育资本,并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逐渐减轻职业地位的性别差异。

(二) 变量介绍

家庭阶层出身:为对以上假设进行验证,我们以父亲的社会阶层定义子女的家庭阶层出身。将父亲的职业阶层划分为:官员与国有企业管理者阶层、私营业主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工人阶层、自雇和小业主阶层、农民阶层。但在我们将父母亲的职业阶层地位设想为一个连续性变量时,我们采用邓肯的国际职业声望量表来定义父母亲的阶层地位。毕竟,同时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的社会影响是不同的。而且,邓肯的国际职业声望量表,是在综合考察被访问者的学历和收入水平后计算的“社会经济指数”。这个指数也被社会学界广泛使用。

教育资本:被调查者的受教育年数。截止到目前,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阶段。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教育的人口所占比重仍然比较低,但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强力推行及高等教育扩招的影响下,自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已得到迅速提高。所以,在年龄同期群中,越是年轻的群体,其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因此,为控制同期群的影响,也为分析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家庭阶层背景的影响,我们在有些模型,也使用教育的类别变量,即将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区别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阶段文化程度和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进行分析。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有些研究,为综合分析家庭背景的影响,或为表现“家庭”的作用,经常将父母亲的教育资本——即将父母亲的受教育年数相加在一起,将其和作为一个变量使用。但我们的研究,为了分析来自于父母亲的不同影响,则分别探视父亲和母亲的教育资本变量。^③

① 有媒体报道说:北京市某重点初中,在小学升初中的招生录取过程中,还没有到电脑派位的时候,就已经录取了占招生人数80%左右的学生,也就是说,只有大约20%左右的名额是用来录取电脑派位生的。尽管如此,在“电脑派位”过程中,如果某些人拿到了“条子”,还会干扰电脑派位的结果,甚至于有专家称,在某些教育资源比较差的学校,经过层层淘汰机制之后,到开学半学期之后剩下初一年级的学生的家长,就连一个科长都找不到了。可见,所谓的“小升初”,与其说考的是家长的社会背景,毋宁说进行的是教育资源的阶层选择。

② 赫克明、汪明:《独生子女群体与教育改革——我国独生子女状况研究报告》,《新华文摘》2009年第10期。

③ 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到市场》,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5页。

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将被访问者的年龄、性别等作为控制变量。即使在将模型区别为不同的出生同期群后，我们仍然将年龄作为控制变量。这中间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同一同期群内部，不同年龄的被访问

者，仍然受年龄的影响。毕竟，不管是教育资源，还是就业时的职业选择，都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时代特征。故控制年龄这个变量是必要的。

表 1 变量介绍

	变量类型	案例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访现职/终职阶层	类别变量	6372	1	6	4.67	1.430
被访初职所属阶层	类别变量	3667	1	6	4.68	1.315
被访身份（党员=1）	虚拟变量	7014	0	1	.07	.248
被访户口性质（城镇=1）	虚拟变量	7011	0	1	.35	.478
14 岁时母亲户口（城镇=1）	虚拟变量	6688	0	1	.21	.405
被访性别（男=1）	虚拟变量	7014	0	1	.50	.500
被访教育资本	定比变量	7009	2	19	8.70	3.233
父亲教育资本	定比变量	3568	2	19	6.96	3.428
母亲教育资本	定比变量	4321	2	19	5.32	3.380
被访年龄	定比变量	7009	18	70	41.44	13.830
被访初职时教育资本	定比变量	3759	2	19	8.66	3.001
被访现职或终职教育资本	定比变量	6529	2	19	8.54	3.226
14 岁时父亲教育资本	定比变量	6384	2	19	5.92	3.504
初职时父亲教育资本	定比变量	5955	2	19	5.81	3.469
被访初职社经指数	定比变量	3625	16.00	72.00	36.0492	8.31138
被访现职或终职社经指数	定比变量	6304	16.00	82.00	36.8435	9.71434
被访 14 岁时父亲社经指数	定比变量	6204	16.00	85.00	35.2555	9.67578
被访 14 岁时母亲社经指数	定比变量	6319	16.00	72.00	32.0797	5.94345

数据来源：2008 年 GSS 调查。

（三）数据介绍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08 年 5 月至 9 月，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式，进行的第二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GSS2008, CASS），^① 覆盖全国 28 个省市区的 134 个县（市、区）、251 个乡（镇、街道）和 523 个村（居委会），共成功入户访问了 7139 位年龄在 18 岁～69 岁的居民，调查误差小于 2%，符合统计推论的要求。这次调查以民生为主题，调查内容涉及到收入、消费、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态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二、家庭阶层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自布劳—邓肯以降，传统社会地位获得模型的经典

做法，就是以被访 14 岁时父亲的教育资本和社经指数，去预测被访的教育资本获得，然后看以父亲为代表的家庭阶层背景，如何影响了被访的教育资本获得。但在布劳—邓肯研究美国时，美国女性的就业率并不高。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是世界上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在模型中置入父亲的变量，而视母亲的影响于不顾，则与现实社会相距甚远。故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母亲的变量，并以此分别分析母亲和父亲对子女教育资本获得的影响。

① 该项调查研究由李培林主持，李炜等率领的社会学所社会发展研究室人员负责调查实施，2008 年的调查（以民生问题为主题）是继 2006 年此类调查（以和谐稳定为主题）后的第二次调查。

表 2 被访者 14 岁时父亲职业地位与被访者初职时教育获得 (%)

	未受正式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	技校/中专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其他
政府工作人员与国营企业管理者阶层	1.6	17.0	44.4	20.3	6.5	5.2	4.9	
民营企业家人阶层		13.3	53.3	6.7	20.0		6.7	
知识分子阶层	.0	7.8	43.1	25.9	5.2	11.2	6.9	
工人阶层	1.4	11.7	54.3	16.9	7.5	6.6	1.6	
小业主和自雇阶层	2.5	17.3	51.9	12.3	6.2	7.4	1.2	1.2
农民阶层	7.2	32.5	48.0	7.5	2.4	1.7	.5	.2
总计	5.1	25.5	48.9	11.3	4.1	3.5	1.4	.1

注：教育获得中既包括自全日制教育获得的教育程度，也包括非全日制或自学考试等获得的教育程度。“工人阶层”中包括了农民工。

数据来源：2008 年 GSS 调查。

从表 2 可以看出，被访 14 岁时父亲的阶层所属，对被访的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父亲的阶层地位越高，子女的教育获得就越多。在“大专”栏可以看出，被访 14 岁时父亲是农民阶层的群体中，只有 1.7% 的人获得了“大专”学历；0.5% 的人获得了“本科及以上”的学历。但在“政府工作人员和国营企业管理者阶层，其子女获得大专学历的比重却高达 5.2%，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则高达 4.9%。当然，作为民营企业家人阶层，其子女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重高达 6.7%，仅次于知识分子阶层的 6.9%。民营企业家人阶层的子女

之所以会获得如此之高的本科文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家长的阶层背景的影响，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这个阶层，大部分是改革开放之后新产生的阶层。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济支持，给子女创造较好的学习条件——尤其是非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条件，提高子女的教育获得。当然，在“文革”之前，也曾存在过一个规模并不太大的民营企业家人（民族资产阶级），但这个阶层的子女，本身就能够获得较高的学历教育。毕竟，教育的阶层传承性，在当时是非常明显的。

表 3 家庭背景对被访初职时教育获得的影响

	模型 1 1965 年之前	模型 2 1966 年~1976 年	模型 3 1977 年~1984 年	模型 4 1985 年~1999 年	模型 5 2000 年~2008 年
性别（男=1）	.261***	.193***	.124***	.089***	-.048
年龄	.042	.051	.140***	.095***	.043
14 岁时父亲社经指数	.008	.081	.125***	.084***	.102*
14 岁时母亲社经指数	-.081	.017	.004	.053	.107*
14 岁时父亲教育资本	.157**	.106**	.168***	.143***	.176***
14 岁时母亲教育资本	.139*	.023	.116**	.172***	.190***
14 岁母亲户口（非农=1）	.244***	.307***	.227***	.213***	.354***
N	285	568	570	1111	654
调整后 R ²	.210	.203	.254	.249	.253

注 1：“***”=p<0.001；“**”=p<0.01；“*”=p<0.05。

注 2：方程中的系数是标准回归系数。

数据来源：2008 年 GSS 调查。

表 3 给我们报告了跨时段的分析。从模型 1——1965 年及此之前就参加工作的同期群中可以看出，在这一历史时段，性别是最主要影响人们的教育获得的变量。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的教育获得，要大大高于女

性。但父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教育获得的影响，却并不显著。这中间的主要原因，是新政权的初建对整个国家的阶层地位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影响。工人阶级被赋予领导阶级的意识形态地位，农民阶级也获得

了土地资产，并在此间的集体化运动中也被赋予了农村领导阶级的意识形态地位。虽然在1949年之前，有产阶级子女更有机会获得较高的教育，但在1949年之后，有产阶级地位的相对抑制，也使有产阶级子女的教育获得受到了负面影响。但父母亲的教育资本，却显著影响了子女的教育获得。父母亲的教育资本越高，子女接受到的教育就越多，积累的教育获得就越高。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城乡差距的存在，也由于长期以来子女只能随母亲的户口落户，14岁时母亲的户口类型，严重影响了子女的教育获得。也就是说，尽管新政权打碎了旧有国家机器，但在教育的阶层传承机制里，子女的教育获得，仍然受家庭背景的影响。

在模型2——1966年~1976年间初次参加工作的同期群里，14岁母亲户口类别所造成的差异更为严重。我们知道，在“文革”时期，虽然政府普及了农村小学和初中，但小学或初中的辍学率却很高。户籍制度又严格限定了老百姓的迁徙，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的硬性管理方式和公共资源分享方式，严重约束了农村人口对教育资源的使用，这使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虽然农村的教育获得，在历史向度上大有改进，但在横向比较上，却难以缓解城乡之峪。“文革”期间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对知识分子阶层地位的抑制，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政策的提倡，也消解了部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不仅父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不见显著意义，而且，母亲的教育资本也失去了影响，父亲的教育资本的影响力度也减少了。

模型3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教育获得的差异。这中间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家庭背景因素的强力显现。不管是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还是父母亲的教育资本，都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发生了深刻影响。在“文革”时期被压抑的读书情节，伴随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也伴随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的正常化，焕发出了青年一代求学积极性。那些接受过更多教育的父母亲，更有能力帮助自己的子女获得较多的教育。所以，父母亲的教育资本，是子女获得更多教育资本的主要支持力。而14岁时母亲的户口类别，虽然也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但与“文革”时期相比，这一影响因素的作用力却有所降低。

模型4反映的是1985年到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前的情况。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虽然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但其标准回归系数的值却大大降低。但父母亲的教育资本，却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这就是说，来自于家庭背景的影响，在社会分化中更集中在教育资本上，而不在于权力或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上。

可模型5反映的问题，却与模型4反映的信息大有区

别。在模型5中，性别的统计影响意义消失了。这预示着计划生育制度在缩减了家庭子女数的同时，也为下一代子女的教育公平带来了福祉。在独生子女家庭，甚至于父母亲难以进行教育投资的性别选择，其不得不将剩余资金只投资于家庭唯一的子女上。但在高等教育的扩招过程中，父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却变得愈发显著。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在1999年之前，都是不显著的，而独在2000年之后，变得显著起来。这一方面预示家庭子女数的减少，给了女性——尤其是城市女性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提升自己的阶层地位，使之能够显著地对子女发挥影响意义。这个影响意义甚至于超过了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影响意义。毕竟，在模型5中，母亲的教育资本标准回归系数和社会经济地位标准回归系数，分别大于父亲的教育资本标准回归系数和社会经济地位系数。但模型5也增加了我们的担忧——来自于“14岁母亲的户口类型”的影响，大大增加了。这就是说，城市户籍的子女，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提升自己的教育资本。

所以，考察整个历史时段的影响，我们会发现，“文革”时期的户口政策，严重影响了适龄青年的教育获得。在1977年~1984年时期，或者在1985年~1999年时期，“户口”因素的影响有所减弱，但在2000年之后，“户口”因素的影响却增强了。这就是说，在教育扩招促使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城市人口却比农村人口享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接受了更高阶段的教育——高等教育扩招的结果，不是缩小城乡差距，而是扩大了城乡差距。尽管农村生源的升学率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提高，但城市地区的升学率，却远远高于农村地区。

另外，在2000年之后，家庭背景对子女的教育获得——不管是来自于父亲，还是来自于母亲的影响，都较之前一阶段有所加强。这证明了我们的假设——父亲和母亲的阶层地位，影响着子女的教育获得。父母亲的教育获得，更直接和更有力地影响了子女的教育获得。教育的阶层传承作用，在市场化过程中，被强化了。

三、家庭阶层所属、教育获得对子女职业地位的影响

前文已经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教育的社会化、教育获得的专业特性与劳动素质标签特性，已成为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就业岗位的表征。一个人获得的教育文凭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预期的求职社会空间，从而也影响其初职阶层地位的高低。如果人们的工作获得，只是依靠教育文凭的指引而分流了劳动力渠道，那我们会只考察教育的分流功能。但现实情况却是：在求

职压力下,人们除依靠既已获得的文凭或教育资本外,还不得不依靠家庭的支持。因此,父母亲所在的阶层属性,就会对子女的求职,存在显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抑或经济制度约束之下,会多多少少地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初职”的阶层地位,可能是家庭背景的部分影响,而不是最终影响。因此,在分时段进行的模型分析中,有些时候,来自于父母亲所代表的家庭背景的某些变量是显著的,但在另外一些时候,来自于父母亲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变量是不显著的。这种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显著或不显著的背后,隐藏着当时社会制度对社会分层过程的干预。

从表4可以看出,在模型1——1965年及以前获得“初职”的同期群人群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人们“初职”阶层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自己获得的教育资本。看父母亲社会经济地位所代表的家庭背景变量就会发现,母亲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影响着子女“初职”地位的高低,但来自于父亲的影响却消失了。这是很奇怪的问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1949年之后新政权的建立所导致的“重新阶层化”,在最初虽然保留了1949年之前地位较高的那些群体的职位,甚至于也照顾到了其子女的就学和工作安排,但在集体化和国有化完成之后,则对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家庭,实行了歧视性的就职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父亲”对子女的“初职”地位获得的影响。

模型2为我们报告了“文革”时期的情况。拿这一时期的数据与前期或后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教育资本——子女“受教育年限的长短”这个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大大缩水。因为城市就业岗位的减少,城市化进程的停滞不前,以及国民经济状况的恶化,国家不得不开始推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千上万的初中毕业生或高中毕业生,不得不开离城市,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结果使“教育变量”在“初职”阶层地位获得中缩减其效力。尽管如此,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户口”这一变量对“初职”地位的影响,却格外显著而有力。应该说,户籍制度在控制了劳动力人口的流向的同时,也严格限制了农民转变为工人的可能性,更严格限定了工人转干的可能性。此一时期,工人职级很少提升,干部级别难以晋升,农民基本被限定在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很难转变自己的职业身份。所以,如果一个人人生来为农民,其就不得不继续为农民;一个人生在城市,就被“安排”为工人。甚至于干部的子女,也在“初职”地位获得上,不得不从普通工人做起。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一个部分,摆脱不了“被改造”的命运——其子女的“初职”地位,不是继承父业,而是首先转变

为体力劳动者。这就是说,很多子女“初职”的社会地位,其实是向下流动,而不是代际继承或向上流动。

模型3向我们报告了“文革”后几年的初职获得情况。从这里可以看出,以父母亲社会经济地位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变量,开始显现其作用。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14岁时父亲的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统计解释力。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过程中,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家长,有可能帮助自己的孩子,考取更好的学校,获得更好的教育。初职时人们的教育资本,对初职社会地位的获得,显示了较“文革”时期更强的解释力。但户口制度,仍然具有市场分割意义。具有城镇户口的人们的“初职”地位获得,明显高于农业户口的人们。事实上,最初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都是农闲自带口粮到城市、农忙又回乡务农的“候鸟式”的农民工。很明显,这些农民工的“初职”,绝大多数属于“农民”。

模型4向我们报告了城市体制改革大规模展开之后的“初职”地位获得情况。在此一历史时段,户口仍然具有统计解释力,但作用似乎在减弱。可来自于家庭背景的影响,却更为显著。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直接而显见地影响着子女“初职”地位的获得。应该说,以社会经济地位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实际上也综合反映了家长的社会职业声望和权力使用能力。这一点与“文革”刚刚结束后的制度调整期很不相同。“文革”结束之后的最初时段,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具有一定功效。但这一时期,家庭背景影响中的主要因素,已经转移到了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上。父母亲双方的社会经济地位,都影响了子女“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

模型5向我们报告了高等教育扩招之后人们“初职”地位的获得情况。在此一模型中,户口仍然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但“年龄”这一变量却具有了统计解释力。年龄在这里的重要意义,可能表现着就业竞争中的职位搜寻。在那些毕业后必须马上就业的人们中,有很多属于家庭经济状况与家庭背景难以支持其延长工作之搜寻时间——尤其是那些贷款上学的大学生,属于典型的“有工作就干”,是“干中学”和“干中跳槽”,故他们“初职”社会地位并不高。但那些在毕业后可以等一段时间,并依靠家庭背景的支持而就业的人,则会获得相对较高的职业地位。这就是说,在控制了“初职”教育资本的情况下,年龄越大,“初职”地位越高,实际表现的是毕业后推迟了初职年龄。在这里,来自于父母亲的影响力,也有所加强。因为在标准回归系数里面,除自己“初职”时教育资本外,来自于父母亲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系数,算是较高的。虽然“初职时教育资本”对“初职”职业地位贡献了最主要的解释力,但相对于前一时期,该系数值则有所下降。这就是说,教

育资本是重要的，但家庭背景的作用却也是重要的。在教育分流人们的职业时，家庭背景的作用具有强化之势。

表 4 初职社会经济指数

	模型 1 1965 年之前	模型 2 1966 年~1976 年	模型 3 1977 年~1984 年	模型 4 1985 年~1999 年	模型 5 2000 年以后
被访年龄	.044	.144 ***	.037	-.019	.092 *
初职时户口（非农=1）	.337 ***	.356 ***	.295 ***	.065 *	.077 *
性别（男=1）	-.067	.034	.062	-.029	.018
参加工作时父亲社经指数	-.060	.019	.004	.103 ***	.118 **
参加工作时母亲社经指数	.187 ***	.019	.097 *	.091 ***	.095 *
14 岁时父亲教育资本	-.095	.048	.091 *	.029	.055
14 岁时母亲教育资本	-.005	-.019	-.028	-.019	.027
初职时教育资本	.332 ***	.168 ***	.207 ***	.375 ***	.302 ***
初职时父亲政治身份（党员=1）	-.027	.019	.035	-.033	.022
N	223	427	512	957	265
调整后 R ²	.190	.222	.274	.218	.285

注 1：“***” = $p<0.001$ ；“**” = $p<0.01$ ；“*” = $p<0.05$ 。
注 2：方程中的系数是标准回归系数。
数据来源：2008 年 GSS 调查。

在“初职”社会地位的获得模型中，性别基本失去了影响意义。或者说在我们的模型中，性别这一变量失去了显著性。但性别的确表现不出歧视性吗？非也！看表 4 可以知道，在“现职”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过程中，在 1984 年及以前，性别的作用未能被本次调查所验证。但在模型 4 和模型 5 中，男性比女性更易于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这说明性别歧视问题，仍然存在我们的社会。

户口制度，一如既往地影响着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不仅影响初职，而且还有力地影响“现职”和“终职”。这是中国社会绵延半个多世纪的最大不公。人们不是因为自身能力的限制，而是由于出身地点的限制，或者与生俱来的那种先天家庭背景的限制，而不能参与社会地位的公平竞争。如何将户籍制度的负面影响消除到最小，也应该是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的社会问题。

在经过“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后，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失去了那种可见的显著意义。但这并不预示家庭背景只影响人们“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因为另外一个非常显著的影响变量——“参加工作时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却长期而持续地影响了人们现职地位的获得。比较模型 3 就会发现，在“初职”地位的获得过程中，在 1984 年之前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初职时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大多是显著的，但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只在 1985 年之后显著。但在模型 4 中，“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每一历史时段都显著。一般而言，

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上迁婚”影响下，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相对低于父亲。所以，母亲“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以及母亲的社会活动能力及交往网络，就代表了家庭的家长最低的那种基本社会资源动用能力。在政治制度的约束之下，来自于母亲的影响，就是家庭最低程度的代际影响。也就是说，家庭背景对子女“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是较低程度的影响。

但在“现职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或“终职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过程中，家庭有时间动用家庭的最大资源，寻找更多的社会资助，为子女谋求和建构“最好”的社会发展空间。所以，来自于父亲的影响力最终发挥了出来。我们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在 1985 年~1999 年这一时段来自于父亲“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失去了显著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 2000 年以后的这一模型中，父亲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力再度显现，并表现得很有力——标准回归系数也很高，达到了 0.142。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获得“现职”或“终职”时人们的教育资本——亦即积累了接受过全日制教育与非全日制教育之后的教育资本，在对“现职”地位获得的影响上，显示了不同时段差异。在 1965 年之前，教育资本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模型 1 中该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最高。但在模型 2——1966 年~1976 年的“文革”时期，“户口”取代了“教育资本”而成为最主要的解释变量——“户口”的回归系数大于“教育资本”。甚至于在模型 3 中，“教育资本”也仅仅与“户口”的

解释力相当。但到模型 4——1985 年~1999 年的模型中,“教育资本”又恢复了最主要解释变量的地位。这说明这一时期,教育对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让人担忧的是,在 2000 年之后,教育

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又恢复到了与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的水平。这说明,教育扩招之后,一方面存在文凭缩水现象,另外一方面也存在就业竞争,这可能提升了父亲“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

表 5 现职社会经济指数

	模型 1 1965 年之前	模型 2 1966 年~1976 年	模型 3 1977 年~1984 年	模型 4 1985 年~1999 年	模型 5 2000 年以后
被访年龄	.113	.195	.013	.105 ***	.004
被访的性别 (男=1)	-.194	.049	.005	.072 *	.044 *
14 岁时父亲教育资本	-1.012	.183	-.005	.001	-.051
14 岁时母亲教育资本	-.406	-.025	-.069	.073	.069 **
现职户口 (非农=1)	.467 **	.315 *	.385 ***	.104 **	.040
参加工作时父亲社经	.498 ***	.142 *	.103 **	.006	.142 ***
参加工作时母亲社经	.127	.034	-.018	-.027	.016
自己政治身份 (党员=1)	-.293	.055	.192 ***	.094 **	.067 **
初职时父亲政治身份 (党员=1)	-.052	.008	-.027	.006	.042 *
现职或终职教育获得	.550 **	.283 *	.383 *	.251 ***	.148 ***
初职时社会经济指数	-.024	.135	.253 ***	.184 ***	.170 ***
N	219	527	548	954	587
调整后 R ²	.208	.215	.279	.258	.286

注 1:“***”=p<0.001;“**”=p<0.01;“*”=p<0.05。

注 2:方程中的系数是标准回归系数。

数据来源:2008 年 GSS 调查。

人们初职时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文革”及“文革”之前,缺少统计显著性。但在“文革”之后,“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对“现职和终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意义开始彰显。但总体来看,在历史趋势上,“初职社会经济地位”对“现职和终职”社会经济地位的解释力有所降低。一个可资解释的原因可能是:就业之后人们再度获得受教育机会的可能性增加了。毕竟,改革开放以来,除全日制教育之外,国家也大力发展了非全日制教育和非学校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考、夜校与远程网络教学的展开,都提升了在职人员的学历水平和知识技能。这使人们岗位地位的提拔,除考虑“初职”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外,文凭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另外,在家庭背景——尤其是在父母亲的支持之下,子女“现职或终职”地位的获得,也会降低“初职”经济地位的支撑力。社会的开放程度,或曰人们就业岗位的可流动性,也在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过程中释放了其应有的效力。一个人最初的工作岗位固然重要,但伴随学识增进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社会流动——尤其是地区之间和单位之间的社会流动,在扩展

水平流动空间的同时,也会带来垂直的流动。

总之,不管是“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还是“现职或终职”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都在新时期增加了家庭背景的作用。但最重要的发现是,在 2000 年之后,人们的职业地位获得,在“初职”时大多受教育资本的影响,但在“现职”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过程中,教育资本固然重要,可来自于家庭背景的作用却也显著。大学扩招的结果,一方面增加了社会各阶层的受教育机会,另外一方面却使城市受惠更多,籍此扩大了城乡差距。这种教育机会扩展的不平等性,传递到就业领域,则是家庭背景的不平等增加了“初职和现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毕竟,在控制了教育资本的情况下,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变量,在人们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和“现职及终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中,都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教育与社会地位获得的双重不平等,会直接阻滞下层社会通向中上层社会的合理通道,造成很强的中国阶层结构的代际继承性。如果下层阶层的代表难以进入上层阶层,如果下层阶层的政治意愿难以在社会上层得到表达,如果制定社会政策的主

要人员中缺少来自于下层阶层的成员，那么，社会流动的封闭性就会增加阶层之间的隔离。这一切，都会给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四、小结及进一步讨论

（一）家庭背景影响了子女接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性

家庭背景，主要是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或者说父母亲教育资本的多少，在任何时代和制度约束下，都显著而直接影响着子女的受教育资本。这就是说，父母亲的教育资本越高，其子女的教育资本也就越高。尽管在“文革”时期，出现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歧视环境，但父亲的教育资本，仍然影响了子女教育资本的获得。而“文革”一旦结束，母亲教育资本的解释力也随之复现。但应该注意的是：在2000年之后，伴随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实施，在大学招生从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之后，来自于父母亲教育资本的影响力，反倒更为增强。伴随教育资本影响力的上升，父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在2000年之后显现了直接而显著的影响。这就是说，“教育的大众化”，实际更加扩展和方便了上层阶层子女的就学。教育的职业阶层传承性，在追求“教育公平化”的时代背景中，反倒制造了教育差距。

不管是来自于父母亲的影响，还是来自于户籍制度的影响，这些影响都属于先赋性因素，而非后致性因素。一个人，不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了其接受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本积累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最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制度配置和资源分配不改变，教育不平等就会永远被维持，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就不会得到根本改变。不管怎么说，收入差距研究得到的最主要结论，就是人力资本或教育资本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收入。

（二）家庭背景对子女“初职”和“现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显化

在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在中国乡村社会的非农化和整个社会的城市化过程中，职业分化使得教育资本对职业地位获得具有举足轻重的解释力。但在不同的时代，这种影响也不同。因为“文革”之前，限制劳动力流动并以户籍制度配置社会福利的约束环境，使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子女，不得不继承父母亲的职业地位，难以提升自己的阶层梯级。即使在“文革”之后的1977年～1984年，户口制度也是人们“初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只是在1985年之后，教育资本的影响才超过了户籍制度的影响。但在教育资本提升解释力的同时，父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却也显化

了对子女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仅次于户籍制度影响的重要因素，且在2000年之后，其还增加了力度。

考虑到父母亲的教育资本和社会经济地位已经传承到了子女的教育资本获得上。所以，父母亲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初职”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显化，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不平等程度的提高。

而且，需要强调的是，那些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影响的因素，在人们的“现职或终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中，也同样发挥着显著而重要的影响。因为现职地位获得，具有家庭支持的积累性效应。也就是说，现职职业地位的获得，积累了父母亲长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在2000年之后变得更为重要——其对“现职”地位获得的解释力，甚至于与子女自己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自己的“教育资本”几乎同等重要。事实上，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在1985年之后，在人们“现职”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中，教育资本的解释力处于渐次降低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不管是在教育资本的获得，抑或是职业地位的获得，中国社会在2000年之后，都强化了家庭背景的作用，使社会流动的先赋性因素提升了社会预期功能。这会增加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性，导致阶层继承的代际继替性。如果不警惕这一点，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创造的机遇共享性，就会为中国社会流动的封闭症状所消解。这会有利于阶层意识的形成，但却不利于社会团结。

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推断，渐成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之所在。学者们发现，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开放性程度的上升。在制度约束、流动空间受限、教育机会不公的影响下，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以及教育部门的突然扩张，会增加教育机会与就业机会的竞争。即使教育扩招降低了招生门槛，而就业竞争所形成的阶层地位过滤机制，既会限制中下层阶层自身代内流动的渠道，也会限制中下层阶层代际流动的渠道。也就是说，看似扩张的教育机会，经过社会流动机制的筛选，会为上层阶层创造更多的机会。而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新经济部门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则更通过上层阶层对教育机会的竞争性选择而排挤下层阶层子女的进入，在社会流动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封闭性”特征。所以，社会流动的“工业化逻辑”，不是伴随工业化过程的展开而自动表现的逻辑，而是被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运行过程所影响的流动逻辑。中国的经验表明，一旦教育机会的公正性被阶层门槛所限制，则就业的公正性会更为严重地被阶层门槛所扰动。

（三）以户籍制度配置社会资源的政策必须改变

在我们的研究中，不管是教育资本的获得，还是“初职和现职”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都深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因为父母亲的户籍在农村，子女们就失去了与城市户籍孩子们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也是由先赋性因素造成的我们时代的不公平。尤其重要的是，表面看起来，在教育扩招^①过程中，农村地区学生们的升学机会也增加了。但需要明白的是：城镇户籍学生们得到了更多升学机会。

城镇和城市教育资源的优势表现，在给非农户口孩子们创造了受教育机会的同时，也为他们选择到更著名的大学带来了资源支持——比如重点大学招生名额的分配比例，就在地区之间存在差距。这种不平等，还衍生到“初职”就业中，还使城市地方保护主义者更多地照顾了本地生源的就业，而集体性地排挤了外地生源。在整个城市就业体制的封闭性政策影响下，户籍制度在本质上更多地歧视了农业户口生源的就业竞争。

事实上，在将农业户口人口视为流动人口的制度割裂中，城市的教育与就业排外政策，还人为制造了整个社会保险制度歧视性政策的连续出台。考察中国城市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就会发现，城市在为本地人口设计了就业保护政策、教育机会优先享受政策、经济适用房购买政策的同时，还为本地劳动力设计了城镇社会保障政策。时至今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城市户籍就业人口的短缺压力下，城市虽然出台了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政策，但这些政策，也无一例外地带有歧视性内容。

考虑到这些内容，如果户籍制度仍然存在，或者城市的公共社会资源仍然以户籍制度作为政策设计的准则，则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和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会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形成更为严重的不平等。这会影响到中国社会城乡一体化的进程，造成中国社会某种程度的

割裂，将城乡二元社会带入城市，形成城市内部的新的二元结构。所以，以户籍制度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现状必须改变。当前一个可行的思路，应该是以人们的常住地设计城市福利保障措施，藉此缩小城乡差距。

（四）要继续消除性别歧视

应该说，伴随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也伴随整个中国社会家庭子女数的减少，曾经一度极其盛行的教育歧视有所缓解。在我们的模型中，教育获得的性别歧视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处于逐渐降低的态势，到2000年以后，其教育获得的性别歧视状况，已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在“初职”社会地位获得中，性别歧视也显示不出来。但在“现职或终职”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近期显示的趋势是——性别的歧视作用强化了。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就业竞争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恶化，使男性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优势。如何健全劳动力市场，逐步减轻直至消除性别差异，也是我们的社会政策需要健全的地方。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马光

① 高等教育的扩招，实际也拉动了高中阶段教育的扩招。虽然自新世纪以来，中国普通高中招生的规模已经开始下降，但大学招生规模却趋于上升，这也给农村孩子们创造了升学机会。但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高中学生的升学机会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城市或城镇户口的学生们，得到了更多的福利，使重点高校的招生名额向这些人更加倾斜。

Family Background Affecting People's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Social Stratum Status

Zhang Yi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nationwide social investigation data conducted in 2008, the writer found: family background comes from parents not only affects respondents' access to education, but also strongly affects their social status' promotion. It indicates that the higher educational level and social stratum status the parents have, the higher educational level and social stratum status their children will have; the lower educational level and social stratum status the parents have, the lower educational level and social stratum status their children will have. Thus,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fter 1999 for the upper social strata are far greater than the lower social strata, which increases china's closeness rather than open characteristics. This will affect the fairnes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should arouse strong concern of policy makers.

Key words: family background; educational difference; social economic status